

古代持家智慧

石地 著

在中国的
历史上，
是聚族而居的
“家”
体大家庭，也就
是宗法社会的
中心代表。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石地 著

内容提要：

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上，“家”是聚族而居的群体大家庭，也就是宗法社会的中心代表。用现代话来讲，“家”就是一个族姓社团，并不像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学步西方文化，只有一对夫妻，或加上父母、子女的小家庭。当然，无论为聚族而居，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或是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总是以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子女为主体所组成的。

天下、国家、社会的基本单位便是“家”。所谓“齐家”的“齐”，在古代读作持家的“持”，也有读作治国的“治”，同时也包括有维持和治理的两重意义。本书带你一览古代那些持家智慧。

ISBN 978-7-89900-358-9

出版时间：2015 年 12 月

总 策 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阮琳越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 55 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 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E-mail : kf@mail.wpcsh.com

电 话：010-58110486

传 真：010-58110456

版 次：2015 年 12 月 第 1 版

字 数：90000

定 价：2 元

ISBN 978-7-89900-358-9



书名：古代持家智慧

目 录

第一章 成由勤俭败由奢

勤俭持家，量入为出

先示弱而后发制人

夺权称霸的五种智谋

要知喜爱者短，更要知厌恶者长

切忌刻舟求剑

重刑与厚赏

明强则可成大事

取，必先给予

有所弃才能有所得

珍爱良臣

第二章 一赏感激，二赏平常，三赏理所应当

笼鸡满市无人盗，兔无归属万人追

君莫做臣事

孝是万事的纲纪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百善孝为先

治家的关键在于家长的修养

可怜天下父母心

教子是人生要事

教子之方

望子成龙，但要因材施教

父子兄弟也要讲究相处艺术

持家以早起为本

慈母养逆子，严宅出孝奴

有亲不一定有情

忠孝世所珍，贤良国之宝

家和万事兴

宠爱不是爱

媒人之言不可信

不可听背后之言

第三章 兄弟如手足，关系也得处

远亲不如近邻

“悦”是侍奉双亲的第一秘诀

收养子女须慎重

做事有恒是第一美德

忠孝是治家之宝

非善不交，知贤必亲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顺势而为
求贤明才可成大业
欲知其人，观其所使
顺势而说
论人之非，当原其心

第四章 与人不可交浅言深
别说过头的话
规劝他人之短要含蓄
对方五分错，只需指三分
出言听语都要谨慎
祸从口出，多言必失
谗言最能伤人
冤家宜解不宜结
要尊重别人的隐私
人贵相知
知音难觅
善于揣摩实情
好人是坏人的老师，坏人是好人的借鉴
学习贤人品质但不蹈袭贤人行为
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
事在人为
考取功名易，苦志励行难
世事变化无常势，人生甜苦两参半

第五章 人生三乐，一贪就错
贪财好色者最好别从政
骄奢是潜伏的祸患
使你顺心如意的常常对你有害
莫做自夸自耀的富贵子弟
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
清官难断家务事
家中也需讲礼节
委任于人要慎重
门户高一尺，气焰低一丈
善听老人的劝诫
为孩子多留遗产是愚蠢的
早立遗嘱可减少后患
义应该讲，钱也应该赚
节俭宜持之以恒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莫取不义之财

分财产贵公允
财物易尽，欲壑难填

第六章 贪财积怨，祸害不远
亲兄弟明算帐
一钱亦分明
周济人要有所选择
上行则下效
怎样处理借贷
非分之收获，陷溺之根源
富人当诫
欲知廉耻就一定要先知足

正文

第一章 成由勤俭败由奢

（宋）司马光

我家本是清寒的家庭，清白家风，世代相传。我生性不喜欢豪华奢侈，还是乳儿的时候，长辈给我戴上金银，穿上华美的服装，我害羞得脸发红，脱下来扔到一边。二十岁那年，侥幸考上进士，在皇上赐给新科进士的宴席上，人人的头上都戴着花，我独不肯戴。同我一起考上进士的人对我说：“花是皇上赐的，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不得已才在帽檐上插了一朵花。

一生不讲究吃穿，只求饱暖而已。但也不敢穿肮脏破烂的衣服，违背世俗常情，免得人家说你假装节俭，以沽名钓誉，只是顺着我不爱奢侈的性情而已。众人都以奢侈、铺张浪费为荣，我却以节俭朴素为美。别人都讥笑我寒伧，而不以此为缺点。回答讥笑我的人说：“孔子说过：‘与其骄傲，宁可寒伧。’又说：‘因为俭省而犯过失的事例是很少的。’还说：‘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而以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什么的。’”古人以节俭为美德，现代的人却以节俭相讥议，唉！太奇怪了。

近年来，社会风气更加铺张浪费。连差役穿的衣裳也和士人的差不多多了。甚至连农民也穿起丝绸做的鞋子了。我还记得天圣年间，先父当群牧司判官的时候，有客人来就要摆酒席款待，每摆一次酒席只倒三五次酒，最多不超过七次。酒是从街上打来的，果品只有梨、栗、枣、柿之类，菜只有干肉、肉酱、菜汤。盛食品的是瓷器和陶器。当时的士族、文人、官员家家都是这样，互相之间并没有看不起的现象。他们聚会的次数多而礼节殷勤，食品虽少但情谊深厚。

现在的士族、文人、官员家却不是这样。假若喝的酒不是用宫中的酿酒法酿造的，果品和下酒菜不是从远方来的名贵货，食品不是很多种，盛饮食的器具不摆满一桌子，就不敢请客。通常都要花费几个月的准备时间，然后才敢发请柬。

如果不是这样，别人就会七嘴八舌，说他不对，以为他吝啬。所以不随波逐流的人很少。唉！风俗败坏成这个样子，有权有势的人虽然不能制止，难道还要助长这种恶劣的风气吗？

又听说李沆在宋真宗朝当宰相的时候，在封丘门建造住宅，厅堂前狭窄得仅能掉转马头。有人说太狭窄了，李沆笑着说：“住宅是要传给子孙的。它作为宰相家厅堂，确实太小了，但作太祝、奉礼郎一类小官的厅堂已经够宽了。”张知白当宰相的时候，他的生活水平跟在河阳做节度判官时一样，和他亲近的人劝诫他说：“你如今薪水已经不少了，而自己的生活水平竟这样，外面有不少人议论你，说你像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一样，是在装穷，您应该稍微随俗一点。”张知白叹息说：“我如今的薪水，让全家人吃好穿好，不愁做不到。但人之常情，由节俭到奢侈容易，由奢侈到节俭就难了。我如今的薪水哪能长保？一旦情况不像今天这样，家里的人习惯奢侈的生活久了，不能立刻节俭，必然会没有着落。哪能像我做官与不做官，活着或死去，家里的生活都天天如此的好呢？”这些大贤人的深谋远虑，岂是那些平庸的人所及的呀！

春秋鲁国的大夫御孙说：“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说的是有德的人皆从俭来，节俭就欲望少，有地位的人欲望少，就不会被物欲役使和支配，那他就可以依正道而行。普通老百姓欲望少，就能约束自己，节约用度，避免犯罪，使家庭富裕起来。所以说：“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的人则欲望多，有地位的人欲望多，就会贪图富贵，不依正道而行，招致祸患。普通老百姓欲望多，那就会多方营求，任意挥霍浪费，甚至于家破人亡。所以做官必然会贪赃受贿；不做官必然去做贼。所以说：“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

古时候的正考父用稀饭来维持生活，孟僖子因此推断他的后代必有显达的人。季孙行父

曾辅佐鲁文公、鲁宣公、鲁襄公，但他的偏房不穿丝织品做的衣服，不给马喂粮食，当时有名望地位的人认为他忠于公室。晋朝的何曾，每天花费在吃上的费用就有万吊，他的子孙也很骄狂，到永嘉末就倾家荡产了。石崇向人夸耀自己奢侈、浪费，最后也为此而身死于刑场。近代的寇准，豪华奢侈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只是因为他功劳大，所以人们不非议他。他的子孙也染上这种豪奢的家风，如今多数穷困。其他因节俭而树立声名，以奢侈而自我毁坏的例子太多了，简直不能一一列举。

勤俭持家，量入为出

（南宋）袁采

创立家业的人，之所以能够把财富越积越多，就是因为他们服装、饮食、器皿、用具上以及在红白喜事的操办和各种日常花费上都很节俭，遵循发家之前的规矩，从不铺张浪费，因此，每天收入的钱财总要多于支出的，所以他们能经常有所剩余。富家子弟之所以容易倾家荡产，就是因为他们服装、饮食、器皿、用具上花费太多，操办红白喜事规模太大，总要依循旧制，并且数位兄弟又把财产分开各立门户，这样日常费用就比从前增加了好几倍。子弟中有能节省费用，作长远打算的，恐怕还来不及呢，何况有的子弟尚未省悟，如何才能把家业支持下去呢？古人说：“从节俭进入到奢侈容易，从奢侈再回到节俭就困难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权贵人家也不能保证子孙永不败坏家业。当他们身居高位的时候，即使不是主管要害部门，国家发给的奉禄供给十分丰厚，别人赠送的礼物钱财也很多，他们面前那么多差役仆从，费用都是由州郡官方供给，他们的服饰、饮食、器皿、用具虽然都极其豪华奢侈，但那些费用都不是由自家财产中支付的。等到这些权贵的后世子孙，没有父祖辈做官时国家拨给的奉禄供给，也没有别人赠送的钱财礼物。差役仆从的薪水，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费用，都不得不从自家财产中支出。况且后世子孙又把一家分成好多家，而各种用度还和往昔一样，怎么能够不倾家荡产呢？这也是形势所趋，不可避免的事，做子弟的，都应量入为出，勤俭持家。

创立家业的人，看见自己所做的事没有不称心如意的，就认为自己的智谋已经十分巧妙高明了。不知道自己的成功是命运里偶然的事，得意洋洋，贪婪索取，不知满足。自认为家业能够永远兴盛下去，不能被败坏，这种想法能不造物者所耻笑吗？那些败坏家业的人早已生在了他们家，或是儿子或是孙子，每天环立在他身边的，都是有朝一日会败坏父辈祖辈创立的家业的人。只可惜他们的父辈祖辈看不到这些人倾家荡产了。前辈有人建造宅第房屋，在东厢房宴请工匠说：“这是建造宅第的人。”在西厢房宴请自家子弟，说：“这些是将来卖掉宅第的人。”后来发生的事果然应验了他的话。近世有个士大夫说：“能够看见的，就慢慢地经营好了；不能够看见的，就不用去谋划考虑了。”这是有见识的人知道有些事情是人力所不及的，所以，他心中宽缓安定，和那些被遮蔽迷惑的人相比，当然是有所不同的。

有些人活在世上，既不考虑祖辈、父辈起家创业艰难，把家业继承下去，也不考虑如果将来家业败落，子孙后代就会失去依靠，难免要忍饥受冻。他们不加节制地生下很多儿女，又对儿女不重视，看做陌路人一样，一味沉溺于酒色之中，赌博下棋，不务正业，败坏了家产，求取一时的享乐。这些人都是家门不幸。这些人连触犯刑律也不害怕，又怎么能用教诲劝导，责骂来使他们回心转意呢？对他们只能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了。

创家立业的人积聚起财富之后，就会每天忧虑不安，恐怕将来仍不免于饥寒交迫的境地；败坏家业的人，使家财逐渐减少，但还气宇轩昂地任意胡为，说：“将来没有什么可担心忧虑的。”这就是所说的“有福之人把有福看做不幸的事，而无福之人却以不幸为好事。”这句话经常在一个人已经是壮年，但还未到老年，或已经是老年但还没死之前应验，有见识的人应当自己领会这个道理。

先示弱而后发制人

（战国）庄子

我听说大王喜欢剑术，因此用剑术来拜见大王。我的剑法十步之内可杀一人，行走千里也不会受人阻碍。击剑的关键，首先是把弱点显示给对方。使对方以为有可乘之机，然后对手发起攻击，以抢先击中对手。我的剑术长短都适应。我有三种剑，任王选用。有天子的剑，有诸侯的剑，有庶人的剑。

天子的剑，拿燕奚谷石城做剑端，拿齐国的泰山做剑刃，拿晋国和卫国做剑背，拿周朝宋国做剑口，拿韩国和魏国做剑把；用中原以外的四境来包裹，用四季来围缠；用渤海来环绕，用恒山做系带；用五行来制衡，用刑律、德教来论断；以阴阳为开合，以春秋来扶持，以秋冬来运行。这种剑，向前直刺无所阻挡，向上举起无物在上，按剑朝下所向披靡，挥动起来旁若无物，在上割断浮云，在下斩断地维。这种剑一旦使用，便可匡正诸侯，天下百姓也都无不服从了。

诸侯的剑，拿智勇之士做剑端，拿清廉之士做剑刃，拿贤良之士做剑背，拿忠厚、圣明之士做剑口，拿豪杰之士做剑把。这种剑，向前直刺也一无阻挡，向上举起也无物在上，按剑朝下也所向披靡，挥动起来也旁若无物；在上效法圆天来顺应日月星辰，在下效法方地来顺应四时，居中则和睦民意来安定四方。这种剑一旦使用，就好像雷霆震撼国境之内，没有不归服而听从国君命令的了。

百姓的剑，蓬头突发低垂帽子，短后的纓冠，粗实的上衣，瞪着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相互争斗在人前面，上斩断颈项，下剖裂肝肺，和斗鸡没有不同，一旦命丧气绝，对国事没有用处。而今大王拥有天子之位却喜好百姓的剑，我认为大王应该轻视这种行为。

夺权称霸的五种智谋

（春秋）管仲

大凡想拥有天下的人，以人情夺得天下的人可以成就帝业，以征伐取天下的可以成就王业，以战争夺取天下的可以成就霸业。用智谋夺取敌国有五种情况：一是侦察敌国国君所宠爱的大臣，削弱他们的威势，使他们怀有二心，那么他们对自己的君主的忠诚就必然减弱。大臣不肯为君主效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有危难。

二是观察敌国的君主暗中憎恨哪些人，然后用重金厚礼去贿赂他们，这样就一定可以得知敌国的形势国情了。身在国内而向外通风报信，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个情况就暴露无遗了。

三是设法让敌国国君听淫乐，以消磨他的心智。送给他乐器和美人，为的是从内部蒙蔽他；送给他善于阿谀奉承的臣子和良马，为的是从外面蒙蔽他；这样内外都被蒙蔽了，这个国家的败势就确定了。

四是必须在表面上同敌国国君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好像要与他共存亡一般。暗地里则派出善于辩辞的人帮他出谋划策；派出勇士使他趾高气扬，再派人到别国唆使他背弃盟约，断绝使者，这就必然发生争斗，两国互相敌视，必然可以钻空子，从中取渔人之利。

五是深入观察敌国的计谋，谨慎地对待敌国的忠臣，挑拨君主身边的人的关系，让他们互不信任，使他们有分离的意愿。这样一来，敌国内部必会自相杀戮。忠臣一旦死去，敌国的政权就可以夺得了。这五种方法都是夺取敌国的智谋。

要知喜爱者短，更要知厌恶者长

（清）曾国藩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要爱民必须先察官吏，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仁术”，“术”字最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就是“术”字最好的、最贴切的意义。又讲遵行大道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的行为上去观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明识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是勤政、胸怀广大、清廉谨慎。勤政如同周文王那样，胸怀宽广如同舜禹那样，廉谨如同汉文帝那样，就会无往不胜。而勤政和廉谨尤为重要，从始至终，一刻也不能忘记。能勤政而且廉谨，才是大胸怀。千古的圣贤人物，哪怕是奸雄，要立于世上，不外也是个“勤”字。能够晓得千古之真理大道的，只是一个“谦”字。我们守住这两条，就可以说是“早晨知道了人间真谛，晚上死也值得”了。

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许多事都很难办，焦虑的时候不是没想过干脆睡到棺材里算了，什么事也不管，也许比现在活在人世更觉快乐。于是焦虑得越多，公事就觉得烦乱，而死期却毫无音信。而我又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被人指责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当上一品官为荣耀，我现在真是把它当做痛苦、懊恼的境界。但被形势所逼，绝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切忌刻舟求剑

（战国）吕不韦

君王为什么不效法先王的法，不是先王的法不好，而是因为无法效法它。先王的法，经过上世到了现在，人们或者增益它，或者减损它：怎么可能效法呢？即使人们不增删，还是不可能效法它。少数民族和中原的法，古今的法，言辞相异内容也不同。所以，古时的名称和当今的说法不同，当今的法律也多不合乎古代的国情。习俗不同的人民和这种情况相似。大家对舟车衣冠滋味声色都有相同的要求，但做出的东西却不同。口音不同，相互听不懂，人家以为说对了，实际上却错了。天下的学者多能辩说，巧言利辞，不追求实效，而追求相互诋毁，以取胜为目的。如果这样，先王的法又怎么可以效法呢？虽然可以得到，但还是不能效法。大凡先王的法律，都和当时相适合，时代不会和法令一起传留到当今，因此，法令虽传到当今了，还是不能效法它。

所以放弃先王的成法，效法他制定法令的办法。先王制定法令的依据是什么呢？他依据的是人。而自己也是人，所以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察当今的时势就可以知道古时，古今一个道理，别人和自己相同。有道之士，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凭借近物知道远物，凭借今天了解古代，来增益自己的见闻，了解未曾亲见的东西。所以察看堂前的影子，就知道日月在运转，阴阳在变化。看见瓶中水结冰，就知道天气寒冷，鱼鳖冬藏。尝一块肉就知道一锅肉的味道是否调和。

楚国人想袭击宋国，派人先在雍水做了渡河的标记。雍水猛涨，楚人不知道，夜晚按标

记涉水过河，淹死一千多人。军士惊号之声把房舍都震塌了。先前他们做标记时是可以渡河的，如今水已涨高了，楚人还按原先的标记走，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今世的君王，效法先王的法令和这相似。当今时代与先王时代不同，先王的法令也有不足，还说“这是先王的法令”而效法它，用来治理国家，难道不可悲吗？所以，安定的国家无法令就会混乱。墨守成法不变就会荒谬。荒谬和混乱都不能用来保护国家政权。

世道变了，时代不同了，变法是理所应当的。比方说好医生，病在千变万化，药也要随之千变万化，病变了而药不变，原本可以长寿的人，也会夭折了。所以，只要做事情就要遵循法令行动，变法的人就要顺应时势而变化。按这个观点去行事就万无一失了。

不敢议论法令的，是百姓；死守成法的，是官吏；能顺应时势变法的是贤明的君王。所以天下有七十一圣，他们的法令各不相同，并非故意要相反，只是时势不同的缘故。所以说，好剑要的是锋利，不必只要莫邪名剑；好马要的是能行千里，不必只要骍骥名马；成就功名的人，就是先王的千里马。楚国有个过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河里，他赶忙在船上刻了个记号：“这是我的剑掉下的地方。”船停了，他从刻记号的地方下水找剑。船已航行了，剑却不会随船而走，这样找剑，不是糊涂吗？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就和这个人一样糊涂。时代向前发展了，而法令不更新，这样来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太困难了吗？

重刑与厚赏

（战国）韩非

坏人，如果会被知道，他一定会有所戒备；如果会被惩罚，一定会停止作恶。不会被知道，他就会放肆作恶，不会被惩治，他便会继续作恶。把便于携带的宝物放在无人之处，即使是曾参那样有德行的人也很可疑；而把白金悬挂在闹市，即使是大盗也不敢拿走。不会被察觉，在僻静无人之地，曾参是否偷了也值得怀疑；一定被察觉，在闹市上大盗也不敢拿走悬挂的白金。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多设监守而且加重刑罚，让百姓用法律约束自己而不是靠廉洁自爱而停止罪恶。

母亲对孩子的爱比父爱深一倍，父亲的命令十倍于母亲，在孩子那里得以施行；官吏对百姓没有慈爱，但他的命令，万倍于父亲得以施行。母亲对子女厚爱，命令却行不通；官吏使用威严而百姓听从，那么是该用威严还是慈爱的策略，就可以决定了。况且父母对子女的要求，是希望他们做事、行动都安全。君主对于百姓的要求是，国家有难就用他们拼死作战，国家平安就让他们努力生产。父母由于厚爱限制子女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而子女不听从；君主没有慈爱，要求百姓拼死出力而且命令得以施行。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仁爱之心而加强威严的权势。

母亲对子女厚爱，子女多数变坏，这是滥用慈爱的后果；父亲比母亲的爱微薄，用竹板抽打教育，子女多半变好，这是使用威严的结果。

现在平民之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互相忍让，用勤劳劳动来相互督促，这样的人家即使遭受战争的灾难饥饿的祸患，也能吃饱穿暖；用丰衣美食来相互疼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关照，这样的人家，遇到天灾荒年，就得卖妻卖子。所以按照法律的原则，开始辛苦但利益长远；按照仁爱的原则，虽有短暂的欢乐但以后却处境困难。

圣明的君主权衡法与仁的轻重，选择最有利的，所以采用法的强制，放弃仁的怜爱。因此学者主张的“轻刑”是乱世亡国的方法。凡是赏罚坚决的，都是为了鼓励功劳和禁止作恶。赏赐丰厚，所希望的事就能很快实现。惩罚重，所讨厌的事也禁止得快。想得到功利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功利的反面。与他希望的相反，怎么会不厌恶呢？希望安定的人一定厌恶混乱，混乱是安定的反面。所以非常希望安定的人一定重赏，非常希望混乱的人一定重罚。现在主张轻刑的人，厌恶混乱的心情不够急切，希望安定的心情也不够迫切。这不仅是

没有治国的策略，也是没有治国的理论。判断一个君主的贤与不贤、愚昧或明智的方法，在于赏罚的轻重。

用重刑，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英明君主的法令，是提供衡量行为的准则。惩罚坏人，并不是仅仅惩治这个所要惩治的人，如果只惩治所要惩治的人，只是惩治一个死人。处罚强盗，也不仅仅处罚这个所要处罚的人，如果只处罚这个所要处罚的人，就只是处罚一个囚犯。所以说：加重一个坏人的惩罚而制止全国的坏人，这才是惩罚的目的。被重罚的人，是盗贼，而害怕的人，是良民。这样，希望安定的人，对用重刑还有什么疑虑呢？

至于厚赏，也不只是奖赏一个人，而是鼓励全国人。受赏的人得到好处而快乐，没有受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报一个人的功劳而勉励一国的人。这样，渴望实现太平的人，对于厚赏重罚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现在不懂怎么治国的人都说：“用重刑会伤害老百姓，用轻刑就可以防止作恶，为何一定要用重刑呢？”这种说法是对治国没什么研究。用重刑能制止的恶行，未必能用轻刑制止；能用轻刑制止的罪行，必定能用重刑制止。因此君主用重刑而制止所有罪恶，所有恶行都被制止，对百姓又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用重刑，必然是坏人所得的利益小，而君主对他的惩罚大。百姓不会因为贪图小利而受到大的惩罚，所以坏事一定会被制止。

古代有句名谚：“人不会被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山岳很大，所以人们谨慎对待它，小土堆很小，所以人们容易轻视它。如果采用轻刑，百姓必定轻视刑罚。犯了罪而不惩罚，就等于驱使全国人民犯罪而抛弃他们，等百姓犯了罪而惩罚他们，就像给百姓设下陷阱。因此轻刑对于百姓就像小土堆。把轻刑作为治理百姓的准则，不是乱国就是给百姓设陷阱，这才是真正的伤民！

明强则可成大事

（清）曾国藩

“智、仁、勇”这三个大德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人们常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啊。

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如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粮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

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们如今侥幸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而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

至于要担当大事，全都落实在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要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柔弱无力的变得坚强。成就大事，没有志气做不成，志向不坚定也就做不好，即使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能保持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致消磨折损，这正是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凡是强盛的国家，必须得到很多贤良的群臣和百官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关系到天命，不全由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弱，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集思广义而使他满足，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又能屈能伸效果是一样的。只有实践曾、孟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胜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与力的强弱，则有因为强壮而迅速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不可一世，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显然不同寻常。近代如陆、何、肃、陈也都是早就知道自己胆力过人，而他们都不能保持到最终。所以我们在不如人的地方、需要自修的地方，谋求比别人强胜才好，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胜就不好。假如专门在胜人处逞强，他的这种强胜，到底怎样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胜能横行乡里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取，必先给予

（春秋）管仲

凡是拥有土地且可管理百姓的统治者，必定抓好农时，保证粮食仓库充实。国家富裕，远方的百姓也就会来归附；土地全都垦辟了的话，百姓就会久留在那儿安居乐业了。仓库充实，百姓便知晓礼节；衣食充足，百姓就懂得荣与辱了。君主服从法度，六亲才可结固，礼义廉耻得以发扬，君主的法令才可顺利推行。所以减轻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奇技淫巧；巩固国家的法度，在于整治“四维”；训导百姓的规范方法，在于敬明鬼神、祭祀山川、敬拜祖宗神灵、恭敬宗亲故旧。不抓好农时，那么财富就不能增长；不利用地势，那么仓库就不能粮满；土地荒芜废弃，百姓就会懒惰；君主挥霍无度，百姓就会胡作非为；不禁止奇技淫巧，百姓就会沉浸其中；不阻止这两种现象，那么刑罚就会变得繁重；不敬明鬼神，小民就不会觉悟；不祭祀山川，君主的威令就难以广传远闻；不敬拜宗庙，百姓就可能犯上作乱；不恭敬宗亲故旧，孝悌伦常就难以完备了。“四维”不能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国家有“四维”作为治理的纲领。缺一维，国家会失去平衡；缺二维，国家会面临危难；缺三维，国家会遭到颠覆；四维都缺了，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被扶正，面临危难有机会化危为安，被颠覆可以复起，但灭亡了就不再有办法了。那么“四维”是什么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礼”即不超越节度，“义”即不独自求进，“廉”即不掩饰过错，“耻”即不从事坏事。因此，不超越礼节，君主的地位就会安稳；不独自求进，百姓就不会尔虞我诈；不掩饰过错，那么行为自然端正；不干坏事，邪恶的事情自然不会发生了。

政治法令之所以能推行，在于它顺应了民心；政治法令之所以会被废弃，在于它叛逆了民心。百姓厌恶忧劳，君主就应该使他们安逸；百姓讨厌贫贱，君主则应该使他们富贵；百姓厌恶危急，君主就应令他们繁衍生息。能使百姓安逸的，百姓将与君主共同忧劳国事；能使百姓富裕的，百姓甘愿为君主忍受一时的贫贱；能使百姓生存得安稳的，百姓才会与君主同度危急之时；能使百姓繁衍生息的，百姓也愿为君主鞠躬尽瘁了。所以刑罚不足以让百姓害怕，杀戮也不能令百姓心服。因此，即使刑罚繁重但百姓不害怕，政令也是不能推行的，杀戮众生但百姓心中不服，只怕君主的地位也不保了。所以，要是能满足百姓这四种欲望，疏远的百姓也自然会亲近；要是做了使百姓厌恶的四件事，亲近的也会叛离。故此，懂得“取，必先给予”这个道理，就是掌握了治国安民的法宝了。

把国家建立在不会倾斜的地方，把粮食积储在取之不尽的粮仓，把财物收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把法令下达在如流水般通畅的地方，把百姓安排在无可争议的岗位来加以任用，向百姓指明犯罪必死的道路，向百姓敞开立功必奖的大门，不做不能做成的事，不追求不能得到的东西，不留在不可久留的地方干不可以再干的事。把国家建立在牢固的地方，就是要把权力交给有德行的人；要使粮仓积储有取之不尽的粮食，就是要百姓生产各种粮食；要令府

库有用之不竭的财物，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要让政令能下达到通畅的源头，就是要使政令顺从民心；把百姓安排到无可争议的岗位，就是要让百姓各尽所能；向百姓指明干了什么必会被杀头，是要申明严刑惩罚；向百姓敞开有功必受奖赏的门，是要明确“论功行赏”的政策。不做不能做成的事，就是要考虑百姓的能力；不追求不可得到的东西，是不强迫百姓去做他们厌恶的事；不留在不可久留的地方，是要大家不去贪取一时的侥幸；不干不可以再干的事，是不欺骗百姓。故此，把权力交给有德行的人，国家就会安定；广泛生产粮食，粮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百姓就会富裕；政令顺从民心，君主的威令自然能广泛推行；按百姓的能力任用他们，那么社会上的用品就会齐备；刑罚严明，百姓就不会干邪恶的坏事；论功行赏，百姓自然会有不畏死难。量民力而办事，那么就不会有办不成的事；不强迫百姓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就不会引发狡诈虚伪的行为了；不贪图一时的侥幸，百姓就不会有怨恨；不欺骗百姓，那么百姓就会亲近君主了。不要因为姓氏不同而不听从外姓人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而不推行外乡人的办法；不要因为国籍不同，而不听从外国。人的经验；而应该像天地一样，不偏私偏亲；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才是当君主的节操。

治理百姓的手段，在于看君主重视什么；引导百姓何去何从，在于看君主提倡什么；号召百姓走什么道路，在于看君主好恶什么。因此，君主想要什么，臣子也想得到什么；君主爱吃的东西，臣子也爱吃；君主喜欢的衣饰，臣子就穿戴它；君主讨厌的事情，臣子就躲避它。不要掩藏你的过失，不要随便更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能的人才将不会来辅助你。在室内讲话。要让全室人都信服；在堂上讲话，要让全堂人都听到，这才是圣明的君主。

城墙沟壑，不足以固守；强大的军队武器，未必足够御敌；地大物博，不足以让众多百姓归顺。只有有德行、远见的君主，才能防患于未然，因此祸患也就不会形成了。不担心天下没有良臣，只担心没有贤君去任用他们；不担心天下间没有财富，只怕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去分享它们。所以知晓时势的人可以任用他为长官；没有私心的人可以放在掌握要政的位置；既知晓时势、善于运用财富，又能知人善用的人，可以推奉他成为君主。迟缓的人总后知后觉，吝啬的人往往会失去他的亲信，听信小人的谗言的人必然会失去能助一臂之力的贤士。

有所弃才能有所得

（战国）韩非

贪生怕死，逃避战争者，本是投降逃亡的人，而世人却尊称他们为珍惜生命之人；学习仁义道德，创建学说者，是触犯法律的人，而世人却尊称他们为通晓经典文献的人；游手好闲却享受丰厚俸养者，是掠夺他人食物不劳而获的人；而世人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满嘴歪理，只会玩弄智巧的人，是虚伪欺诈之人，而世人尊称他们为善辩有智的人；用剑杀人者，是凶暴而求侥幸的人，而世人却尊称他们为有锋芒而勇敢的人；包庇坏人不举报坏事者，是应当处死的人，而世人却尊称他们为以友情为重，并为朋友扬善隐恶的人。这六种人，是世俗称赞有加的。

为国家危难赴汤蹈火，为忠诚而献身者，是为节气而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不会打算的人；少见闻，服从法令者，是遵守法律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浅陋无知的人；努力耕作，自食其力者，是会创造财富的人，而社会却贬低他们为缺少才能的人；人品敦厚，朴实纯正，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却贬低他们为愚蠢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做事者，是尊重君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胆怯怕事的人；打击敌人，告发坏人者，是使君主明理的人，而社会上却贬低他们为谄媚小人。这六种人，是世俗所诋毁的。

奸诈虚伪无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是如此地赞扬他们；耕作劳动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而社会却又如此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六反”。平民百姓根据对自己的利益而称赞前六种人，君主听到虚名而礼遇他们，礼遇他们，必然会奖赏他们。百姓根据对自己的害处而

诋毁后者，君主被世俗蒙蔽而轻贱他们，轻贱他们，就必然会惩罚他们。所以名声和奖赏就落在自私、干坏事、应当治罪的人头上，而诋毁和惩罚却落在无私、为公行善、应当奖赏的人身上，如是，想让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时有句谚语：“行政事就像洗头一样，虽然要脱落头发，也一定要洗头。”舍不得废弃脱发而忽略新头发的好处，这是不懂权衡利益关系。用石针割刺疮是很痛的，喝药是很苦的，因为怕苦而不割刺疮不吃药，就会治不好病，活不下去。现在君主和臣下的关系，不像父子之间有那么深的恩德，可君主却用道义约束臣下，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有裂痕了。而且父母对于儿女，生男孩就互相祝贺，生女孩就溺死之。儿女都是父母的亲生骨肉，但男孩受祝贺，女孩却被溺死，是因为父母考虑到以后的好处，计算长久的利益的缘故。父母对于子女况且用计算的心理对待，何况是没有父子恩情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让君主放弃求利之心，采用相爱的原则，是要求君主具有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不熟悉君臣父子之间的恩德，是诡诈和欺骗的行为，所以英明的君主不会接受。

圣人治理国家，要审慎于法律禁令，法律禁令清楚明白，那么官吏就会依法治理。坚决实行赏罚，赏罚公正不偏私，百姓就会听从，百姓听从使唤，官吏尽心尽力，国家就能富强，国家富强，军队就会强大，霸主的事业就可成就。成为霸主，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获大利的心情去治国，所以他任命有相当能力的人担任官吏，他的赏罚没有偏私。要使臣民明白：努力耕作，拼命作战，就可以建立功劳，得到爵位和俸禄，得到爵位和俸禄，就可以成就富贵之业。获得富贵，是人臣的最大利益。臣下怀着获大利的心情办事，所以肯冒险，用尽自己的力量也不怨恨，这就是说君主对臣下不一定要仁爱，臣下对君主不一定要尽忠，就可以成就霸主事业了。

珍爱良臣

（春秋）管仲

圣明的君主善于协调国家的矛盾，君主表面看上去平易，实际内心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放任情性者会伤害他的精神，修美质地者会伤害他的文采，变化得再好也必须合于名分，改革得再好也必须顺应时势的发展，不能预见事物的端倪者，是要遭遇灾难的。

因此要做到顺应地利，服从上天的旨意，丰厚地祭祀祖先，打开国门，并且丰厚地祭告各位祖先。顺应地利，是因为能够参悟天地的客观规律；服从上天的旨意，是因为能够保证行动方向明确；厚祀祖先，是因为保持同祖先同道。祭祀祖先合乎礼节，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打开国门，是因为可以研讨其他国家高明的言论。丰厚地祭祀各位祖先，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端杯酒而躲避小的灾难，这样通过除去小的灾害，使它不能成为大的灾害来加强内部。至于在国外的发展，还要能够威慑其他强大的国家，旌表它们的谦虚。这样，全社会都将归顺公正，臣子与百姓都坦示其赤胆忠心而来。

国门阻塞，百姓喧闹不安，怎样防备呢？选择上天保佑，鬼神赐福，被人爱戴的人，给他重任显示出他的才干来，这就可以安定百姓了，要是能干的和不能干的人都聚集在齐国，那该怎么办呢？可以用崇高的荣誉来表彰优秀的臣子，用重要的职位来使良臣显示出他的才干来，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假如他出身于亲族，那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得遭人嫉妒陷害；假如他出身于平民百姓，那就要多多接近，免得被人挑拨冤枉。这都是保护良臣的措施。

大臣的地位太高了，反而容易被人陷害，要消除这个祸患，以求防患于未然，该怎么办呢？这要像爱护古木一样爱护大臣，延深它的根基而不去砍伐它，加固它的藤而不去割掉它，深深地犁土而不使它枯竭，使树快长高大而不去修剪它，加强日照而不使它昏暗，帮助树木生长繁茂而不使它们有任何损伤。君主的言论，不能胜过以上这六项保护措施中的任何一个，

即使遇到凶险也必然成为好事，所以国事是会安定而圆满的。

没有事的时候积蓄财富，等到有事的时候用，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积蓄了财富的人应该拿出大量的余粮来消费，尽情用美丽饰物装扮车马，多酿造酒来尽情饮用，这样一千年也不用出门去讨饭吃。因为这种侈靡的消费反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剩余的收入也有它的用途，一部分收取的财物用以满足日常的需用，如果不需要这份需求，便可将钱财放在市场上，来积累生财富。但有时收入会越积越少，有时又可能越积越多，这叫作营利无常。老百姓也没有别的什么宝贵的物品，只是把追求利益看得很重要，上下奔波劳碌，只是因为利益的驱使。有了财利然后才能流通，有了流通然后才成立城市。假如财利呆滞而交易不顺畅，那就要查出原因，另找生财的路子。

看到不能使用的官员，就应该削职为百姓。选择名声良好的，使他成为百姓的长官；一贯都表现良好的，即可以用来做治理国家的人才。功业没有完成的不可以独自享受名位，事业没有完成的不可以谈到名位。功业完成后可以独自享受名位，事业完成后可以谈到名位，这样才可以享受赐给的祭肉。

第二章 一赏感激，二赏平常，三赏理所应当

（春秋）管仲

对贤者不可以严厉地管制，对能者不可以淹滞而不使用，防患于未然，总是容易的。水所流经的地方，人们都聚居在那儿；土壤肥沃的地方，人们都不肯离去。这就好像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在祭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交杯饮酒的人都不肯离开座位，更何况那些追逐名利的人们呢？让全国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等待危难国家中的君主，来显示他的才能，这不等于在危害国家吗？

利不可以废弃，所以人们要从事流通利的行业；神明不可以废弃，所以人们都要来供奉；宇宙是不停留的，因此其经常会变动而从旧的转换成新的。得到上天帮助的人，身居高位也不会倒台；得人心的人，即使身处低位也不会轻易被人战胜。圣明的人和君主都重视这个道理。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友谊。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即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不讲求用贪多而排斥精少，君主俨然不动，看上去像墙那样踏实，而且做人做事讲求公平、正直。

法制与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怕变革。天地就好像有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是天地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千万不能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好机会就会白白地与神一起消失了。

人一日也不可能离开衣服、饭食，而父母兄弟却是终有一天将会离去。所以圣明的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人死了才会相亲相爱，而活着的时候却难以相处。行赏的事情，奖励一次人们看做是“赏”，第二次时人们则把它看做是常规，第三次时。人们则把它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小小的行赏能使人们满意，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把行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权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改变今后行赏的方式。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住不挑选什么乡，也不挑选什么样的君主来侍奉。他们卖出货物就是为了谋取利益，买进货物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采伐之后就拿去卖，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地增长。朝廷上上下下的人都可以进行奢侈消费，君主、臣子都可以相互亲近，君主和臣子的财产便不会藏着而不用了，这样，贫民就有了工作而有饭吃了。另外，把有田邑的人迁移到市场，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怎样能与这么多贤能的人亲近呢？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害怕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听从君主，这还谈什么亲近呢？如果人没有什么追求，用强迫的力量是不能使他屈服的，用巧妙的智谋也不能治理他，这就好像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处理好了。所以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要过多，士人就自动亲近了。不选择是谁而都给予禄赏，这叫白白地仁慈了一番；不选择人而进行敛取，竭泽而渔，这叫做白白地给人以利益。明白了这两条，并且以之作为行事的准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笼鸡满市无人盗，兔无归属万人追

（战国）商鞅

法令在今天把它确立了，明天早晨就要使天下的官吏和民众都明白地了解它、执行它，使人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整齐而又没有一点偏私，该怎么办？

制定了法令，就要设置官吏。凡是资质能够通晓法令内容的人，认为可以充当全国各地主管法令的长官，就应上报给天子。天子就分别使他们去主管法令，他们都走下宫殿台阶，

接受任命，并出发到官府就职。

每个主管法令的人，如果胆敢忘记执行他所主管的法令所说的条文，那就分别按他们所忘记的法令条文来惩处他们。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有调动或死亡，就立刻使接替的人学习和诵读法令所说的内容，并给他做出规定，叫他在多少天内要通晓法令所说的内容；如果不合乎规定，就制定相应的法令来惩处他。如果有人胆敢删改法令，只要增减一个字以上，就判处死刑，绝不赦免。

官吏们以及民众如有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内容的，主管法令的官吏都应该分别按照他们原来所要询问的法令明白地告诉他们。而且要分别制作长一尺六寸的信符，信符上明确地写上年、月、日、时以及所询问的法令条文，用这种方式来答复询问法令的官吏和民众。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不答复，等到询问法令的官吏和民众犯了罪，而所犯的正是他们所询问的法令条文，那就按照官吏或民众所询问的法令条文所规定的罪名，分别惩处主管法令的官吏。在答复询问的当时，把信符的左券交给询问法令的官吏或民众，主管法令的官吏则谨慎地把信符的右券藏在木匣子里，并把它藏在内屋，用主管法令的长官的印盖在封泥上封好。即使后来主管法令的官吏死了，也仍然按照符券上所写的内容来办理。

法令都复制副本，将一个副本放在天子的宫殿里，给法令设立戒备森严的禁室，并配有门锁，用一个禁止入内的封泥把它封起来。如果有人擅自打开这禁室的印封，以及进入禁室看禁室所藏的法令，以及在禁室中删改法令一个字以上的，都判处死刑，不予赦免。朝廷每年都按照禁室中收藏的法令向官吏颁布一次法令。

天子设置三个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法官，御史那里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丞相那里设置一个法官。诸侯国、郡、县都分别给他们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这些法官和法吏都听命于朝廷中的一个法官。郡、县、诸侯一接到朝廷送来的法令，就学习推敲这些法令的内容。

官吏和民众想知道法令的，都可以去问法官。所以天下的官吏和民众没有不知道法令的。官吏明确地知道民众都了解法令，所以官吏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来对待民众，而民众也不敢犯法来冒犯法官。如果官吏对待民众不遵循法令；那么民众就可以去问法官，法官就把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民众就把法官的话严厉地告诉给官吏。官吏知道事情会这样，所以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民众，而民众也不敢犯法。

像这样，天下的官吏和民众即使有贤能、善良、巧辩聪慧的资质，也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去歪曲法令；即使家有上千镒黄金，也不能利用一株钱去行贿犯法。所以智巧、诡诈、贤能的人都去做好事，都努力管住自己去奉公守法。民众愚昧就容易管理，而这是由法令明白易懂而又必须执行的政治措施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法令，是对民众的命令，是进行治理的根本措施，是用来防备民众的工具。搞政治而抛弃了法令，就好像想不挨饿而抛弃了食物，想不受冻而丢掉了衣服，想到东方而朝西走一样，它不可指望是很明白的了。

一只兔子在奔跑，却有一百个人去追它，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份，而是由于它到底属于谁还没有确定。出售兔子的人挤满了市场，而盗贼不敢夺取，是由于兔子的所属关系已经确定。所以，当事物归谁所有的名分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是尧、舜、汤那样的贤君也都会像奔马似地去追逐它；而在名分已经确定之后，就是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

现在法令不明确，名分不确定，天下的人就可以议论它了。人们的议论，个个不同而没有一个确定的意见。君主在上面制定了法令，臣民却在下面议论它，这是法令不确定，让臣民代替君主议定法令，这就是所谓的名分不确定。名分不确定，就是尧、舜那样的人也都都会卑鄙地去追求财物，更何况是一般的人呢？这是使邪恶盛行、君主被夺去威势、国家灭亡、政权覆灭的道路。

从前圣人著书而传到后代，必须由老师讲授它，人们才懂得书中所说的内容及概念；如果不由老师讲授它，而是各人凭自己的想法去讨论它，那就到死也不能懂得书中的概念及其